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

——兼论中国特色经济思想史探索历程与东财贡献

赵　雷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在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经济思想史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历史纵深、方法自觉和文明根脉支撑。本文立足整体学科视角，以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为内在关联领域，围绕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简史、中国特色经济思想史探索历程和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展开探讨，并结合东北财经大学实践进行案例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头领域，具备源头性、反思性和桥梁性功能，是经济学内生的基础学科；党的十八大前，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并行发展的格局已形成，但系统协同仍有待加强；进入新时代，应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由并行发展转向系统协同，构建以术语辨析和“术语革命”为基础、以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凝练为关键、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指向的“术语—理论—体系”连续转化机制。从东北财经大学的学术积累看，经济思想史能够通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掘、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引领、国外理论比较甄别，并依托课程教材建设、研究平台搭建和学术共同体建设，支撑中国经济学形成主体性表达。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知识生产；“两个结合”；经济学方法论；东北财经大学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26）09-0019-13

一、引　言

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1]。202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2]。对于经济学而言，自主知识体系意味着立足中国历史、中国实践和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形成能够解释中国问题、概括中国道路并与世界展开平等对话的概念体系、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3-4]。在这一背景下，经济思想史在学术领域的功能和地位有必要被重新界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特别是在现代经济学日益模型化之后，经济思想史常被视为具有回顾性、补充性功能的学科领域，主要承担梳理学说流变、保存学科记忆和补充理论背景等任务，因而似乎位于经济学知识生产的“后台”[5-7]。但是，若把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理解为概念生成、问题解

收稿日期：2026-04-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研究”（23&ZD129）
作者简介：赵　雷（1984-），男，河北沧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经济思想史研究。E-mail：281603310@qq.com

释、方法反思和体系化建设相互贯通的持续过程，经济思想史将显示出重要的源头意义[7-8]。一门学科要具有真正的知识主体性，首先需要回答自身从何而来、以何为据、凭何成立。对于中国经济学而言，这一点尤具特殊意义。本文所指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思想史维度上的基础性展开。它以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为内在关联领域，围绕概念源流、问题前史、理论反思和中外融通，形成具有历史纵深、方法自觉和比较视野的知识组织方式与研究范式。中国经济学若要摆脱对现成理论范式的被动依附，需要在既有模型和案例分析之外进一步追问[3-4]：中国现实中的重大经济问题如何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如何经过创造性转化进入现代概念建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如何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和升华中为我所用[9-10]。这些问题，仅靠当代经验归纳难以回答，仍需借助经济思想史重建历史纵深、恢复问题意识并保持方法自觉[7-9]。因此，本文对“经济思想史”进行广义理解：立足中国学科建制，将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作为具有内在关联的知识领域加以把握。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者研究对象不同、理论来源有别，但在中国学术语境中被共同组织到同一个核心问题之下，即中国经济学如何在现代世界知识体系中理解自身、借鉴他者并形成主体性表达。由此出发，经济思想史既聚焦过去的学说流变，也参与面向未来的知识生产。

现有研究已经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3-4，9-10]。不过，仍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考察。其一，关于经济思想史的讨论。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单一子学科、具体人物或专题层面，对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如何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形成共同问题意识和整体学科结构的系统讨论仍显不足。其二，关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讨，现有研究已提出许多有价值的判断，但较少把全球学科史、中国探索史、新时代构建与高校案例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因而难以完整说明中国经济思想史如何依托长期历史积累，发挥参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功能。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拟从整体学科视角重新界定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地位，并把全球学科史、中国探索史、新时代建构史和高校案例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考察经济思想史如何通过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协同，构建“术语—理论—体系”连续转化机制，并参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因此，本文的主命题是：经济思想史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头领域，主要在于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协同发挥源头性、反思性和桥梁性作用。进入新时代，关键任务是坚持“两个结合”，推动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由并行发展转向系统协同，构建以术语资源发掘、术语辨析和“术语革命”为基础，以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凝练为关键，以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为指向的“术语—理论—体系”连续转化机制。具体而言，经济思想史能够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帮助中国经济学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经济思想、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中的有益成果，以及中国实践提出的现实问题，转化为现代概念、理论问题和能够进入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形态。鉴于此，其一，本文概述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简史，阐释其源头性、反思性、桥梁性功能。其二，本文梳理中国特色经济思想史的探索历程。其三，本文提出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其四，本文以东北财经大学为例，分析高校在探索中国特色经济思想史和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中的贡献。

二、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简史

要说明经济思想史何以成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头领域，还需把这一判断放到

经济学发展的整体历史中考察。从全球学科史看，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知识结构中的位置及其变动，是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结构性现象，而非缘于某个国家或某个时期的偶然安排[6]。大体来说，这一领域经历了形成、边缘化、重新受到关注等阶段，其基础性功能也在这一曲折历程中不断显现[7]。

经济思想史最初内生于政治经济学的发生过程，并非外加于经济学之上的历史说明[8]。现代经济学的思想源流及其早期政治经济学传统，形成于道德哲学、自然法、法学、政策论说、自然神学和历史叙述等多重知识传统的交汇之中；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财富、秩序、劳动、分配和市场的讨论，也大都在与既有思想传统的持续对话中展开[11]。因此，经济思想史在其早期发展中即承担起追溯概念源流、重建问题前史和说明理论得以成立的历史条件等任务[12]。19世纪后期以来，伴随着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和学科分工的细化，经济思想史逐步发展为相对独立的研究与教学领域，并通过编史传统、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帮助经济学形成相对稳定的内部记忆、理论谱系和学科共同体[13]。现代大学制度和学科分工的形成，也使经济学必须通过经典文本、代表人物和关键争论来组织自身谱系[14]。经济思想史的制度化，使经济学得以形成学科记忆、自我叙述能力和学科边界意识，超出了单纯增加边缘性知识的意义。对不同学派的分类、对重要思想家的排序、对关键争论的重述，看似是知识整理，其实也是经济学自我界定的一种方式。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回顾和重述学术遗产，使经济学在持续分化的过程中维持某种自我连续性、边界意识和判断能力[15]。尤其在近年来的全球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经济思想史越来越显示出文明比较的功能，成为考察不同文明和社会中的思想传统如何理解财富、市场、劳动与国家关系的重要窗口[16]。因此，经济思想史贯穿于学科自我形成、自我说明和自我组织过程，是理解经济学知识结构的一种“内生之学”，而非经济学成熟之后才出现的“后见之学”。

然而，进入20世纪中期，伴随主流经济学日益走向数学化、模型化和形式化，经济思想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学科边缘[17]。这种边缘化既表现为课程设置和资源配置的变化，也反映出现代经济学知识理想的转向：经济学越来越强调形式化推演和技术化表达，对其历史、制度、价值语境的关注相应减弱[18]。一方面，评价标准越来越偏向模型的形式化处理能力，理论的历史来源、概念的生成过程和学派之间的长期争论逐渐被视为不够“前沿”，甚至不够“科学”[19]。另一方面，经济学在追求普遍化表达的过程中，制度差异、价值前提和历史条件的敏感性不断弱化，使许多原本带有特定语境的理论命题被表述为一般性规律。在这样的知识氛围中，经济思想史常显得“不合时宜”，原因正在于它不断提醒人们：任何理论都有生成背景，任何模型都有适用边界，所谓“主流”也只是特定历史时期占优势的理论范式。换言之，它一度被边缘化，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始终保存着对学科前提、理论边界和方法选择的反思能力[5]。而当经济学过度依赖抽象模型和技术理性取向时，这种反思能力反而显得更加不可替代。因此，20世纪经济思想史的边缘化，不宜简单理解为其学术重要性的自然衰落，更应放在现代经济学特定阶段形成的主导方法偏向中加以理解[17-19]。实际上，越是在技术主义高涨之时，经济思想史越能提醒人们：经济学并不只是计算与预测的量化分析手段，也是一门嵌入历史过程、制度结构、价值前提之中的社会科学[20]。

21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史在若干研究与教学中再次彰显其基础性意义[21]。学者重新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各类非主流传统之中，并审视被遮蔽的概念、被边缘化的学派和被简化的争论。这表明，经济学发展并不是一条单向前进的知识道路，而是由多种问题意识、价值判断和分析路径共同构成的复杂进路。经济思想史的作用在于，通过呈现若干“备选理论”，恢复经济学内部原本存在的多元性，使理论重新回到更开放的争论状态。这已超出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校正。随着全球南方研究、文明比较研究的发展，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正由“西方经济学内部史”拓展到“全球经济思想史”[16]。不同文明关于财富、交换、国家治理、民生、

正义的理解，被重新放入同一学术框架中加以比较。与此同时，数字人文取向下的“文本即数据”的演化趋势和文本挖掘方法的发展，增强了学者把握概念长期演化和思想传播路径的能力。因此，经济思想史重新受到重视，这既包括对若干旧典的再阐释，也体现为其在新的全球知识结构中解释现实和比较文明的能力。因此，21世纪以来经济思想史重新受到重视，并不意味着它已经全面回到经济学知识生产的中心位置。这一变化表明，当现实危机更复杂、范式分歧更明显、文明比较更不可回避时，经济学在若干研究与教学场域中重新需要历史纵深、理论多样和方法自觉[21]。

综上所述，经济思想史至少具有三大核心功能：一是追溯概念源流、重建问题前史的源头性；二是揭示理论生成条件与适用边界的反思性；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之间进行比较、甄别、融通与转化的桥梁性。因此，把经济思想史重新定位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源头领域，是符合现代经济学发展逻辑的学理判断。

三、中国特色经济思想史的探索历程

学科发展简史表明，经济思想史作为具有源头性、反思性和桥梁性功能的基础学科，始终参与现代经济学的自我形成与自我说明。中国经验进一步表明，这门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自身的问题意识和知识生成逻辑，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对西方学科分类的移植。晚清以来，经济思想史在外来理论输入、本土思想阐释、马克思主义方法引入与现实问题回应的互动中逐步展开，先后经历了西学东渐中的学科萌芽与主体意识觉醒、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确立与学科结构重塑、恢复重建与体系化格局逐步形成，为新时代进一步推进体系化建构做了学科准备。

（一）晚清至1949年：西学东渐中的学科萌芽与主体意识觉醒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的出现，首先与近代中国知识体系重组密切相关[22]。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经济思想资源，从《管子》《盐铁论》到《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再到历代经世文编、赋税论说和改革实践，都蕴含着关于财富、交换、赋役、民生、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的大量论述。只是这些内容长期散见于经史子集、政论奏议和制度实践中，尚未在现代学科框架下被普遍、系统地整理、比较和理论化阐释[22-23]。19世纪末以后，随着西方经济学的持续译介和近代知识体系的不断完善，学者开始意识到，“经济学说”及其历史演进本身也可以成为独立研究对象[22-24]。

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学者在接受外来理论的同时，开始较为自觉地以现代学科形式重述自身经济思想传统[22]。梁启超曾提出撰写“中国生计学史”的设想，陈焕章以英文系统阐释儒家经济思想；甘乃光、李权时、唐庆增等人也先后对先秦以来中国经济思想进行分期梳理和体系整理[22，24]。这表明，中国学者已超越单纯以西方经济学为参照的研究方式，并开始面对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学术版图形成的条件下，中国自身是否拥有可以进入现代学术表达的经济思想传统，又应如何用现代学科语言重新表述这种传统[22-24]。

因此，晚清至1949年这一阶段主要完成了两项基础性工作。一是现代学科的萌芽，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古代关于食货、赋役、农商、公私、义利等问题的讨论，可以作为一种思想传统被系统整理[23]。二是本土主体意识的觉醒，在引入西方经济学的同时，中国学者开始主动追问自身知识来源，尝试把“介绍外来理论”“重述本土传统”放在同一学术框架中加以理解。

同时，这一时期的探索总体仍处于启蒙、译介和初步整理阶段[23]。学者虽然已经开始用现代学科方式重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但对相关概念的历史演变、问题结构及其制度语境的把握总体上仍较为初步，制度化发展较多依赖少数学者的个人推进。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探索，往往仍带有明显的“格义”和中西比较色彩，即较多借助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拟配、重述西方经济学观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虽已重新进入学术视野，却尚未普遍

转化为现代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表达、理论问题和学理化阐释[22]。这一阶段提出了一个后来长期延续的根本问题：如何在现代学科体制中，既理解他者，又重述自身。

（二）1949—1978年：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确立与学科结构重塑

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进入一个具有重要转向意义的发展阶段[25]。与民国时期主要借助一般进化论、历史学派或西方经济学框架来整理经济理论相比，这一时期更突出的变化是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步成为研究的主导性方法论[26] 334-342。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利益、社会形态、国家制度等进入经济思想史研究，明显改变了学者观察中国历史经济思想的角度[27]。同时，相关研究逐步进入社会主义教育与学术体系[25]。这种转变最先体现在中国经济思想史方向上。巫宝三、胡寄窗、赵靖等学者在复杂条件下推进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史料整理、资料选编和通史写作，使相关研究由侧重人物评论和专题考辨，逐步走向更具整体性的系统编纂和学科叙述[27-29]。这些工作重新界定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也尝试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租赋役、农业基础、商品货币、财政制度、国家管理、社会结构等问题。同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中心的教学和研究逐步开展，外国经济学说的介绍、批判也在课程与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这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思想史研究已超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资料整理的单一范围，开始呈现中国传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外国经济学说研究彼此关联的知识格局。这一阶段的研究较为系统地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确立了明确的方法论基础，并使其进入国家教育与研究体制，成为社会主义知识生产的一部分。从学科演进看，这为改革开放后相关研究方向的恢复、分化、进一步整合提供了必要前提[25]。但是，这一阶段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受学习苏联经验和特定政治环境影响，某些时期的研究较多强调理论评价和规范判断，较少展开细致的文本、概念与历史语境分析，政治化、教条化倾向时有显现[30]。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引进和传播使经济思想史学科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但如何将其与中国历史材料、传统概念和现实问题更细致地结合起来，仍是学科发展需要继续面对的重要问题，这也构成了改革开放以后学科恢复重建的重要背景之一[25，30]。

（三）1978年至党的十八大前：恢复重建与体系化格局逐步形成

1978年以后，随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推进，经济思想史学科进入恢复重建并逐步走向繁荣的发展阶段[25]。这一时期，经济思想史的发展既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增加，也体现为学术共同体、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和研究平台的系统恢复，使其由“恢复旧业”走向“重建体系”。从学科史回顾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大体经历了由反思走向繁荣、再到不断拓展的过程；从经济理论发展背景看，1979—1991年又可视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理论的“学术繁荣阶段”[25，31]。

首先，成立多个学科组织和学术共同体。1979年9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在北京成立[32]；1980年6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在上海成立[33]；1987年8月，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召开[34]。同时，研究生教育、学位点建设和相关课程设置也逐渐恢复并拓展，这标志着经济思想史及其相关研究方向重新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制度承载[25]。在这些组织、平台和课程体系的支撑下，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思想史研究逐渐摆脱零散个体努力的状态，开始具备持续积累、代际传承和全国性学术交流的基本条件。

其次，相关研究的对象和侧重点也在这一时期逐步分化并趋于清晰。中国经济思想史在通史编纂、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中不断深化，开始更自觉地发掘中国本土问题和概念资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及相关研究在摆脱简单教材化、宣传化倾向后，逐步恢复其理论史研究性质，并继续为整个领域提供方法论和理论指导；外国经济学说史则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迎来繁荣期，承担起译介、比较、筛选和重估西方经济学传统的重要任务[35]。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化始终受到新的现实问题牵引：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既要求中国重新认识西方经济学，也要求重新理解中

国的历史经验，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二者放进较为统一的学术框架中加以判断[31]。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有企业改革等重大议题，也使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在中国历史、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国外理论之间展开比较、筛选与融通[26]536-547。从这个角度看，该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逐步成型，既依托学术组织的恢复运转，也受到经济理论所面对现实问题变化的持续引领[31]。这一阶段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科完成了从“单向恢复”到“整体格局逐步成型”的转变。学科建制恢复并趋于稳定，相关研究方向的基本格局逐步形成，研究由较多侧重政治评价逐渐转向更重视历史、文本和理论的综合分析，中国学术界在引入外来理论的同时，也开始更自觉地思考传统经济思想的发掘和中国经济学主体性问题[25，36]。进一步地，这种整体结构可以理解为围绕同一核心问题逐步形成的功能性分工，而非行政划分的偶然产物或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知识的机械拼接。其中，中国经济思想史回答“我们从哪里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回答“以什么方法和立场理解世界”，外国经济学说史回答“如何理解他者并与之比较”。因此，党的十八大以前这段历史的意义集中体现为：经济思想史不仅作为学科已经存在，而且整体格局已基本形成[25，31]。

但必须看到，这一时期的学术繁荣更多的是历史积累和结构拓展，与成熟理论体系的形成仍有一定距离。其局限性同样明显：相关研究方向分工渐明，协同机制仍较为有限；学术界更加重视中国经验，但传统范畴向现代学理的转化机制尚未明确；学科与当代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联系有所增强，但总体上仍以解释性工作为主，较少从历史、现实和比较中主动生成新的中国式表达。这表明，党的十八大以前经济思想史学科完成的工作，主要是条件准备和结构搭建，系统的概念提炼、理论生成和话语表达仍有待在新时代推进。这也构成了下文讨论新时代如何促进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协同，并构建“术语—理论—体系”连续转化机制的逻辑前提。

四、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思路

（一）从历史积累走向体系自觉：新时代学科转型的历史逻辑

在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将经济思想史纳入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在既有学科史研究积累基础上的深化和提升[1-2]。所谓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意指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推进思想史维度的体系化展开，以使经济思想史更深地嵌入中国经济学。作为这一转向的历史基础，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八大前，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在学术史梳理、文本整理、通史编纂、课程恢复和学科建制等方面已形成较为丰厚的积累，为进入新时代后的体系化构建提供了学科前提[25，35-36]。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重点仍在于学科恢复、资料整理，相关研究尚未充分转化为系统的概念提炼、理论生成与体系化表达。进入新时代，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经济思想史也需要由探索积累转向体系化构建。

本文所谓的体系化构建，强调经济思想史更深层地嵌入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生产过程，而非仅仅增加一种新提法。自主知识体系不应是零散观点的简单拼接，而应体现为标识性概念提炼、原创性理论形成、方法反思与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学术共同体建设之间的有机衔接。对于经济思想史而言，这意味着学术研究需要在人物、文本和流派介绍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几个更具建设性的问题：哪些中国历史经验能够转化为现代经济学问题，哪些传统范畴能够提炼为当代概念，哪些外来理论可以借鉴并须经甄别重构，已有成果又如何通过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建设实现持续积累和有效传承[37-39]。沿着这一方向推进，经济思想史可以更充分地把思想遗产转化为理论表达，把学科积累转化为稳定的学术支撑。

（二）坚持“两个结合”，重塑学科定位并推动三大子学科协同

进入新时代，经济思想史学科首先需要完成学科定位的重新界定。其根本遵循，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以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握研究方向，以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提出的新问题锚定研究对象，以人民立场为价值坐标，并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意味着，经济思想史需要从一般性的学说回顾，进一步转向面向中国问题的知识建构。具体到学科研究层面，这一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问题场域，以人民立场为价值坐标，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历史经验、现实实践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相贯通为知识组织方向。进一步地，这种转向重塑的是知识组织方式，而不仅是研究对象的拓展。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实现系统协同，围绕同一问题意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成果进行比较、甄别、融通和转化。

据此，经济思想史的学科定位可从三个层面来把握。其一，它是源头性学科，能够为当代中国经济学提供概念前史、问题前史和理论前史，使学科在面对现实问题时不会悬浮于去历史化的术语体系之中[38]。其二，它是反思性学科，通过揭示理论生成的历史条件、制度背景和文明前提，校正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偏向，增强中国经济学对理论边界、适用条件和价值前提的自觉。其三，它是桥梁性学科，连接古今中外，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之间发挥比较、甄别、融通与转化的桥梁作用，使中国经济学在开放比较中形成主体性判断。要把上述学科定位落到实处，关键在于坚持“两个结合”，并落实到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对象选择、问题设置和概念阐释中。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言，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把思想史对象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重新贯通，为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筹发展和安全、绿色转型、数字经济治理等重大议题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历史纵深和学理支撑。就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言，经济思想史研究尤其要体现学科优势和主体性，其中的关键是通过问题转换、范畴辨析和理论重构，使传统经济思想由历史材料和思想传统进入现代学术表达，而不是把传统概念原封不动地搬用到今天[37，39]。

在此基础上，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需要由并行发展走向系统协同。中国经济思想史重在发掘本土逻辑和重释文明根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重在提供方法论基础和理论指导，外国经济学说史重在比较、甄别与融通。三者研究对象虽有差异，却共同服务于同一个核心问题，即中国经济学如何在理解自身、借鉴他者和确立主体性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的协同，实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为根脉、以外国经济学说为比较镜鉴的知识组织过程，其最终指向是在比较、融通与重构中形成中国理论表达。

（三）构建“术语—理论—体系”连续转化机制：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理论的生成逻辑

如果说坚持“两个结合”规定了新时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向，那么，在学理层面，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形成“术语—理论—体系”连续转化机制[1，40-41]。“术语”主要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融通中，经由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协同研究而被发掘、辨析，并具有概念化潜能的学术术语和思想范畴。它们经过问题化、概念化和学理化处理，才可能凝练为具有主体性和辨识度的标识性概念。“理论”是“术语”经过问题化、概念化和学理化处理后形成的解释框架，既包括原创性理论的生成，也包括对传统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外国经济学说的比较、甄别与创造性转化。“体系”则指概念、理论和方法进入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及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学术共同体等载体之后形成的系统化组织[1, 40]。因此，“术语—理论—体系”可理解为经济思想史服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连续转化机制，并不替代“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自主知识体系”的表述。其核心在于通过术语辨析、概念提炼和理论生成，推动思想史资源进入系统化知识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术语向现代学理转化需要经过筛选与重构。某一术语是否具有转化价值，取决于三个条件。其一，该术语具有相对稳定的问题指向，而不是偶发性的修辞表达。其二，该术语内部嵌入较为明确的经济关系，能够组织关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治理等方面的分析。其三，该术语具有跨时段的解释潜能，经过概念重构后仍可进入当代现实讨论[41]。具备这些条件的历史术语，才能从古籍中的名词进一步转化为现代经济学的概念资源。历史术语的现代转化，关键不是把古代词汇直接对应到现代经济学术语，而是要识别其背后的问题结构、制度语境和价值关切。只有当术语能够稳定组织某类经济关系，并在当代问题中重新获得解释力时，它才可能成为标识性概念的来源。以“本末”为例，如果只把它理解为“重农抑商”的传统口号，就很容易将其归入古代政策偏见的范畴。但若把它放到中国传统社会的财政基础、产业结构、国家治理和社会秩序中考察，就会发现，“本末之辨”处理的是一个更复杂的结构问题：何种生产活动构成国家与社会稳定的基础，商业扩张、货物流转和利益流向应在何种边界内展开，国家又应如何在经济活力与秩序维系之间实现平衡[42]。从这个角度看，“本”不仅涉及农业在物质生产中的基础地位，更关系到粮食供给、税赋来源和社会稳定；“末”也并非抽象地否定工商业，而是在特定制度条件下讨论其扩张边界、利益流向和秩序后果。经过这样的语境还原与概念辨析，“本末”所呈现的已超出产业排序，展开为一种关于实体经济基础如何维持、商业扩张如何规约、国家调节如何展开，以及发展秩序如何稳定的早期问题意识。将其放入当代中国发展语境中，可以为理解实体经济根基、脱实向虚、资本规范、产业安全和国家调节边界等问题提供历史参照和概念启发。由此可见，传统术语的价值并不在于提供现成答案，而在于为当代问题提供参照和概念入口。经过语境还原、问题转换和理论重构，“本末”可以从传统治国术语转化为理解实体经济基础与资本运行边界的分析资源。至于“轻重”“义利”“富民”“均平”“食货”等术语，也都可以沿着同样路径进入后续研究；相关讨论可避免平均铺陈，围绕少数核心范畴进行集中阐释。

进一步地，术语转化还应避免两种倾向：一是把传统术语直接等同于现代经济学概念，从而削弱其历史语境和文明内涵；二是仅作古典文献解释，停留在词义训诂和思想材料整理层面，难以进入当代问题意识。较为稳妥的路径是先通过文本细读和制度语境还原厘清其原初含义，再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中的现实问题进行概念重构，最后在与马克思经济学和国外相关理论的比较中检验其解释力。完成这一过程后，传统经济思想才能从历史知识转化为能够参与当代理论建构的概念资源。这有助于避免把传统思想简单现代化，也有助于避免把外国概念直接套用于中国经验，从而使术语辨析成为理论创新和体系建设的中介环节。对于经济思想史而言，这正是从材料整理走向知识生产的关键一步。

术语经过问题化和理论化处理的下一步是体系化建构。理论只有进入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才能摆脱零散观点状态，实现持续积累和有效传承[40]。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建设既要提炼有辨识度的概念，也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研究方法。未来可重点凝练三类表述：一是强调经济思想史追溯概念源流、恢复学科历史纵深的基础功能；二是强调史论结合的方法要求，即在历史叙述中提炼理论、在理论反思中返回历史；三是强调“术语—理论—体系”连续转化机制，即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推动三方面资源经过术语辨析进入现代学理建构，并进入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与这些概念提炼相配套，方法上应以文本细读、语境分析、概念辨析和史料考证为基本功，强化史论结合、古今贯通、中外比较和问题导向；载体上则应推进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建设，使之与理论生成相互支撑与相互促进。

总之，新时代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核心任务，是在“两个结合”的基础上，通过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协同，构建“术语—理论—体系”连续转化机制，推动三方面资源在经济思想史维度上转化为理论表达、方法原则，并形成相应的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支撑，而非简单延续既有学说史叙事。在这一基础上，经济思想史才能从以历史积累为主，进一步转向自觉服务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并为中国经济学形成更具主体性、学理性和历史纵深的知识结构提供源头支撑。

五、探索中国特色经济思想史和构建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中的东财贡献

前文主要从整体学科视角展开论证，进入高校层面，需要考察这一判断如何在连续的学术积累中落地。具体到东北财经大学，相关学术积累的价值体现在清晰的问题链条和推进路径上。因此，对这部分的关注，可以从“高校做过哪些具体工作”这一实践层面推进到一个具有学理意义的问题：一所高校如何依托自身长期积累，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掘、理论比较融通、方法论反思与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学术共同体建设逐步连接起来，形成较有连续性的学术推进路径。

（一）发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从中国经典与制度实践中提炼问题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经济思想发掘方面，东北财经大学形成了持续的研究积累。相关研究并不把古代经济思想处理为人物、命题和政策主张的简单罗列，而是从经典文本、制度安排和历史演变中提炼可进入当代中国经济学问题意识的概念和思想线索。以张守军的相关研究为代表，围绕赋役问题和《管子》轻重理论等议题的讨论，揭示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生产基础、财政能力、社会秩序与国家治理之间的深层关联，展现了古代经济思想关于国家调控与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43-44]。其中，对赋役问题的研究，不只是财政制度史意义上的整理，而是把赋役置于国家能力、社会承受能力和民生基础之间的关系中加以理解[43]。从这一角度看，赋役并非单纯的征收制度，而是连接国家财政、基层社会和民众生计的制度环节；《管子》轻重理论不宜仅被理解为价格调节思想，而应放在国家调节物资流通、稳定财政基础和维护社会秩序的脉络中加以考察。进一步地，这一方向推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由“历史材料”转向“问题结构”：通过对赋役问题、《管子》轻重理论和国家调控等议题的持续研究，中国传统中关于国家与市场、农业基础与工商活力、治理秩序与社会稳定的思考，由此呈现为可进入当代讨论的概念前史[44]。这一研究并非为古代政策作简单辩护，而是着重揭示其历史条件、思想限度，以及经由现代阐释后可进入学理建构的问题链条。

（二）拓展比较视野：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理论之间保持甄别与融通

在理论比较与融通方面，东北财经大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外国经济学说史能够在介绍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提升中国经济学的历史化理解、批判性筛选和现实性检验能力，并以马克思经济学为重要参照。以张凤林的相关研究为代表，其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以资本理论与后凯恩斯主义研究为中心，并由此延伸到制度变迁与转轨经济等现实议题，超出了简单介绍西方经济学流派的范围[45-47]。例如，通过对资本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及相关理论争论的梳理，张凤林揭示了西方经济学内部并不存在单一、无争议的“正统道路”，不同理论范式背后始终存在方法论前提、制度条件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45-47]；尤其在资本理论和后凯恩斯主义研究中，这项工作重新揭示了被主流叙述遮蔽的历史性、制度性冲突，并在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理论之间建立起可讨论、可比较的对话关系[45-46]。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比较并未停留在脱离现实的文本梳理层面，而是始终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实际问题相联系。其关于制度变迁等问题的研究，体现出“先厘清理论，再进入现实”的研究路径[47]。这一研究方向的价值在于，它不是把西方理论作为可直接移植的理论，而是把不同理论放回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制度背景中考察。由此，中国经济学在借鉴外来理论时，可以同时保持开放性和判断力，避免把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命

题当作普遍尺度。因此，外国经济学说史不再只是“输入西学”的渠道，而是成为了中国经济学进行历史化理解、批判性筛选、现实性检验并推动理论融通的重要中介[46-47]。

（三）深化方法论反思：从经济学方法论到基础理论自觉

在方法论反思与基础理论自觉方面，东北财经大学的相关探索由学说史梳理延伸到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哲学、人文经济学的反思。以朱成全的相关研究为代表，这一方向的关注重点转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等问题[48]，并进一步反思经济学何以出现科学主义与过度形式化偏向、中国经济学的文化根基何在等根本命题[48-50]。在这一研究路径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视为中国经济学形成自身理论风格的文化资源和理论根脉，而非经济学的外在附饰[50]；人民立场、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问题，不再只是外部政策目标，而被转化为经济学内部必须回应的价值论与方法论问题[49]。这类反思说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能只依靠对象和材料的中国化，还需要在研究目的、价值前提和方法边界上形成自觉。因此，经济思想史成为连接学说史梳理与经济学基础理论反思的重要通道。

就此而言，这一方向把经济思想史的反思功能推进为关于经济学何以可能、如何可能及如何形成中国经济学基础理论自觉的系统思考，使经济思想史在提供思想资源与比较坐标的同时，能够为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自觉、价值论重塑、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准备[49]。就学科功能而言，这一方向更宜理解为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方法论反思与经济哲学方向。它并非游离于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之外，而是进一步推动经济思想史研究向经济学基础理论反思层面深化。

（四）从高校实践到学术路径的形成

通观上述研究实践可知，东北财经大学在经济思想史及相关领域形成的，并非若干成果的简单相加，而是由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发掘、理论比较融通到方法论反思逐步展开的问题链条。其内在逻辑可概括为：从中国历史与经典中提炼传统经济思想，再通过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理论比较形成甄别与融通能力，继而在经济学方法论、价值论与人文经济学层面提升为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的综合表达。这一路径的特点，不是由某一位学者代表全部方向，而是不同研究取向之间在客观上形成了相互衔接的关系：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阐释夯实概念前史，理论比较保持开放性与判断力，方法论反思与人文建构则推动其走向更高层次的综合表达。若与前文所论三重知识功能相对照，这一路径体现了经济思想史在新时代参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所需要的几个基础环节：在源头性层面重建中国经济学的概念前史，在桥梁性层面保持与外来理论进行比较、筛选和融通的能力，在反思性层面推进对经济学方法、价值与学科边界的重新审视。由此，东北财经大学的发展历史较清楚地展示了一所高校如何在自身传统积累中，把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个方面的资源、现实问题、理论建构与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学术共同体等载体支撑逐步接通，而不只是说明“高校在这一领域做过研究”。进一步地，东北财经大学的案例还说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需要依托长期研究积累、稳定教学安排和持续共同体建设，在具体学科场域中形成可复制、可延展的知识生产路径，而不能停留在抽象的表达层面。高校实践由此成为连接学科传统与新时代建构任务的重要环节。

从成果形态看，这一路径既表现为论文和专著，也通过通史写作、教材编纂、课程建设、研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构建等方式外化出来。换言之，东北财经大学的经验不只是“做了什么”，更在于“如何形成了可以持续推进的学术方向”。当然，研究路径仍主要处在持续深化之中，尚未形成成熟体系；其中的现实意义在于说明，高校参与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可以从打通问题链条入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经济学阐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的甄别与融通、方法论与价值论的反思，以及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等载体支撑逐步组织起来。对于经济思想史学科而言，启示正在于此：高校可以依托自身较长期的研究积累，把分散成果整合为具有连续

性、辨识度与传承性的学术路径，从而为前文提出的总体命题提供一个具体的实践例证。

六、结　语

经济思想史是中国经济学保持历史纵深、方法自觉和比较视野的重要基础领域，而非现代经济学之外的附属性回顾。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研究对象不同，理论来源有别，但在本文视角中共同指向同一核心问题，构成相互关联的整体性知识领域。因此，经济思想史参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是通过中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和外国经济学说史三大子学科协同，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国外哲学社会科学为有益滋养，构建以术语辨析和“术语革命”为基础、以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凝练为关键、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指向的“术语—理论—体系”连续转化机制。

面向未来，经济思想史学科应在历史积累和结构扩展的基础上，转向以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为导向的体系化发展。这意味着，相关研究需要继续深耕中国历史与经典中的问题结构，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动其同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相贯通，并在与世界经济学理论传统的比较融通中，通过概念提炼、理论生成、方法反思及课程教材、研究平台和学术共同体建设，把已有积累转化为稳定的知识生产机制。东北财经大学的实践探索表明，高校可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支撑与实践载体作用，并依托较长期的研究积累，把分散成果整合为具有连续性、辨识度与传承性的学术路径。在此基础上，经济思想史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学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形成易于被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并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相关研究和讨论。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6-05-19)[2026-03-10].http://www.scio.gov.cn/31773/31774/31783/Document/1478145/1478145_1.htm.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EB/OL].(2025-10-28)[2026-03-10].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2386/202511/content_7047415.html.

[3] 胡乐明,毛安琪.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5,16(4):3-12.

[4] 逄锦聚.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和方法[J].经济研究,2023,58(8):4-14.

[5] Blaug M. No history of ideas, please, we’re economist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1, 15(1): 145-164.

[6] Backhouse R E. History of economics, economics and economic history in Britain, 1824-2000[J]. European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04, 11(1): 107-127.

[7] Goodwin C D.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C]//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5886-5900.

[8] 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朱泱,孙鸿敞,李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7.

[9] 李黎力,兰无双.经济学的演化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J].教学与研究,2026,60(3):14-26.

[10] 程霖,段博,刘凝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2024(2):84-104.

[11] Robbins L.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LSE lecture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11.

[12] Blaug M. The historiography of economics[M]. Aldershot: Edward Elgar, 1991: 1-42.

[13] Backhouse R E. Early histories of economic thought 1824-1914: vol. 1[M]. London: Routledge, 2000: ⅸ-ⅹⅳ.

[14] Mcculloch J R. The literature of political economy: a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select publications in the different departments of that science, with historical,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notices[M].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 Longmans, 1845: ⅷ-ⅸ.

[15] Coats A W. The sociology and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conomics: British and American economic essays volume II

[M]. London: Routledge, 1993: 1-2.
[16] Barnett V. 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global economic thought[M]. London: Routledge, 2015: 1-13.
[17] Blaug M. The formalist revolution of the 1950s[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03, 25(2): 145-156.
[18] Mirowski P. More heat than light: economics as social physics, physics as nature's econom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368-378.
[19] Debreu G. The mathematization of economic theory[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1, 81(1): 1-7.
[20] Heilbroner R L. Modern economics a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J].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979, 11(2): 192-198.
[21] Duarte P G, Giraud Y. The plac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mainstream economics, 1991-2011, viewed through a bibliographic survey[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2016, 38(4): 431-462.
[22] 张亚光，沈博. 格义、分野、自立：近代中国经济学的探索与转型[J]. 财经研究，2021，47(1)：109-123.
[23] 程霖，毕艳峰. 奠基时期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就与地位[J]. 财经研究，2008，34(10)：27-39.
[24] 陈焕章. 孔门理财学[M]. 韩华，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0：3-4.
[25] 程霖.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九届年会综述[J]. 财经研究，2001，27(1)：58-63.
[26] 张问敏. 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899—1992[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27] 赵靖. 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C]//北京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经济学集刊》编辑委员会. 经济学集刊：第2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26-140.
[28] 巫宝三，冯泽，吴朝林.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1-3.
[29] 胡寄窗. 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8.
[30] 何玉长. 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四论[J]. 财经研究，1999(11)：21-28.
[31] 赵晓雷. 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J]. 财经研究，1998，24(12)：3-11.
[32]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介绍[EB/OL]. (2023-12-19)[2026-04-05]. http://marxism.cass.cn/xhzx/jjxsxh/js/202312/t20231219_5719263.shtml.
[33]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学会概况[EB/OL]. (2024-09-25)[2026-04-05]. http://ie.cssn.cn/kygz/yjjg/xhjjh/202409/t20240925_5786951.shtml.
[34] 李无.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研讨会侧记[J]. 经济科学，1988(2)：78.
[35] 赵晓雷. 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及其对现代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J]. 财经研究，1997，23(9)：10-18.
[36] 胡寄窗. 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歧见[J]. 学术月刊，1986(3)：20-27.
[37] 裴长洪. 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两个结合"[J]. 经济思想史学刊，2024(3)：3-19.
[38] 张林. 经济思想史研究在构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N]. 光明日报，2019-06-18(11).
[39] 程霖，段博. 坚持"两个结合"加强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学理化阐释[N]. 光明日报，2023-10-10(11).
[40] 顾海良. 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与中国特色"经济学说的系统化"[J]. 中国社会科学，2016(11)：20-28.
[41] 孙正聿. 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J]. 中国社会科学，2024(7)：38-51.
[42] 朱永. 重本抑末思想研究[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26(6)：1-7.
[43] 张守军. 春秋时期的赋役思想[J]. 经济科学，1994，16(1)：71-74.
[44] 张守军.《管子》轻重理论的财政思想[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2(1)：94-96.
[45] 张凤林. 西方资本理论的发展与演变[J]. 中国社会科学，1995(2)：61-74.
[46] 张凤林. 马克思经济学对后凯恩斯学派的影响[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12)：59-70.
[47] 张凤林. 理解制度变迁：当代转轨经济学若干争论评析[J]. 经济学动态，2015(5)：108-119.
[48] 朱成全. 经济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J]. 财经问题研究，2003(3)：10-15.
[49] 朱成全. 人文经济学何以可能?[J]. 财经问题研究，2005(10)：3-12.
[50] 朱成全. 文化传统与经济学[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7，9(5)：19-26.

Thoughts on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xploratory Journey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ZHAO Lei

(School of Economic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Summary: As discussed here,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n China is not limited to the narrow subfield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It denotes the foundational unfolding of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economics along the dimension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aking its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ral thread, this article treat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nd the history of foreign economic thought as internally connected fields. It examines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he exploratory journe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pproaches to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s endogenous to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dern economics. Although once marginalized as mainstream economics became increasingly formalized and model-oriented, it has preserved source-providing, reflective, and bridging functions by tracing conceptual origins, revealing theoretical boundaries, and connecting different intellectual resources. In China, the modern discipline underwent disciplinary germination from the late Qing period to 1949,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arxist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and disciplinary restructuring from 1949 to 1978, and recovery, reconstruction, and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an overall pattern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for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three subfields had developed in parallel, but their systematic coordination still needed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new era, building a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requires upholding the "Two Integrations", promoting the shift of the three subfields from parallel division of labor to systematic coordination, and establishing a continuous "terminology-theory-system"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The academic accumulation of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ows that universities can transfor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al resources, useful foreign scholarly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problems arising from China's development into modern conceptual expressions, theoretical questions, and systematic forms of knowledge through the excavation of traditional economic thought, comparative assessment of foreign theories, reflection on methodology, and development of curricula, textbooks, research platforms, and scholarly communities. Accordingly, constructing this knowledge system supports Chinese economics in elevating Chinese experience into Chinese theory and forming conceptual, theoretical, and discursive systems marked by subjectivity, academic rigor, and international intelligibility.

Key words: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Chines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economics; knowledge production; "the Two Integrations"; economic methodology;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责任编辑：巴红静）（校对：刘欣琦）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6.09.002

[引用格式]赵雷．中国经济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思路——兼论中国特色经济思想史探索历程与东财贡献[J]．财经问题研究，2026(9)：19-31.